

《人间词话》与现代派词学

□ 孙克强

1908年发表的《人间词话》是一部用传统词学批评文体的词话表现新思想的著作。其思想观点与清代中后期占据主导地位常州词派有明显不同乃至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间词话》具有“反主流”“反传统”的意识。《人间词话》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词学著作,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现代词学思想及词学流派的生成和发展上。民国时期具有现代精神的词学家也被称为“新派”。从现代派词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王国维是启蒙者,胡适是奠基者,胡云翼、郑振铎等人是开拓者。现代派词学烙有《人间词话》深刻的影响印记。

一

《人间词话》诞生的清末,正值传统词学的常州派词学思想笼罩词坛。常州词派最具有旗帜性范畴就是张惠言《词选序》中提倡的“意内言外”。张惠言阐释“意内”为“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言外”指创作的表现要有“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特点,要求“惻隐眇眇”,不能“放而为之”。常州派词学家陈廷焯把“言外”的特点阐述得更加明确:“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白雨斋词话》卷一)可见,提倡含蓄蕴藉,反对直露浅白,是常州词派的家法,也是传统词学的一贯要求。

《人间词话》崇尚的审美理想境界却与传统词学完全相反。王国维论词标举“境界”,而境界的核心则是“真”:“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境。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的“真”有两个层面:内在情感之真

兰苑撷芳

——明清女性总集的编纂特点和流变

□ 赵厚均

对女性作品的关注、编选于齐梁时已开其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种《妇人集》即可见一斑,嗣后唐代蔡省风《瑶池新咏》可窥见唐代女性创作的盛况,不过,这些都只是奔涌长河发源时的涓涓细流而已,女性总集的编选还得等到明代中叶女性创作的繁荣之后才真正兴盛。

从时代断限来看,明代之前的几种总集基本上都是当代作品的汇编,而明代则呈现出相反态势。现存的二十种总集中,除《伊人思》和《诗余笈》为收录明代闺秀之集外,其余均为历代作品的汇集。其间断限又有差异,如《彤管新编》只收录明代之前的,他如《诗女史》《彤管遗编》《魏房朝列女诗选名媛笈》《名媛诗归》《古今女史》等则兼收明代的作品,呈现囊括古今的意识。清代的女性总集则较多地关注当下,标明“国朝”“本朝”的选本大幅增加,如《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国朝闺秀正始集》《国朝名媛诗绣针》等。尚有虽未标明时代,其实是只收录清朝的,如《撷芳集》《诗媛名家红蕉集》《吴中香奁社草》等;当然,通代的总集仍然常见,如《然脂集》《古今名媛百花诗余》《古今名媛百花诗史》。总体来看,清代闺秀总集较多地寓目于当代,这与清代闺秀诗歌创作的繁荣是分不开的。

从地域来看,不强调地域的综合性选本自然是主流,但对地方文献的关注也日盛一日,明代王彛来编《娄江名媛诗集》是第一部以地域为选录标准的总集,可惜并未传世。清代以来地域性总集逐渐增多,有省级的总集,如《广东古今名媛诗选》《广东名媛诗选》《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

和外部表现之真。他欣赏的是那些能够迅速、直接打动读者的作品。在外部表现之“真”方面,王国维与传统词学是对立的。《人间词话》称外部表现之真为“不隔”,“词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与之相反的则是“隔”,所谓“隔”就是表达不真切、不直观。王国维特别反感“隔”,他批评姜夔词“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又批评史达祖、吴文英词“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王国维批评的“隔”,与传统词学所提倡的意外言外,含蓄蕴藉十分相似。正是在审美效果的要求上,《人间词话》与传统词学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

现代派词学家深受王国维《人间词话》审美观的影响。胡适所持的审美标准与王国维高度相似。胡适说:“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务,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意内言外’。张惠言阐释‘意内’为‘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言外’指创作的表现要有‘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特点,要求‘惻隐眇眇’,不能‘放而为之’。常州派词学家陈廷焯把‘言外’的特点阐述得更加明确:‘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白雨斋词话》卷一)可见,提倡含蓄蕴藉,反对直露浅白,是常州词派的家法,也是传统词学的一贯要求。

王国维与现代派词学家在审美标准的原則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强调审美的直观性、明晰性;颠覆了从南宋以来直至

等,更多的是地市级范围的总集,如《三台名媛诗辑》《海昌闺秀诗》《海昌女史诗存》等。从文体来看,综合性选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明代最早的女性总集,《彤管新编》“卷凡八,诗歌、铭颂、辞赋、赞谏,凡六百五十四首。《璇玑图》诗凡一篇,序、诫、书、记、奏、疏、表凡三十三卷,杂著一卷。在综合性选本兴盛的同时,明代也有不少单纯的诗歌选本,如《诗女史》《彤管遗编》《古今女史》等;清代则诗歌选本蔚为大观,如《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撷芳集》《国朝闺秀正始集》等。前三种都选录诗人逾千名,诗作数千首,为现存选本中规模排前三位的总集。明代无专门的女性总集,清词为中兴,故词选总集亦复不少,如《林下词选》《众香词》《本朝名媛诗余》《古今名媛百花诗余》《闺秀词钞》等。女性文章历来较少,故词选亦罕,有《玉台文苑》《续玉台文苑》《汉魏六朝女子文选》《名媛尺牋》等。

从入选者的身份看,综合性选本仍是主流,以求全为鹄的,如《彤管新编》《彤管遗编》《名媛诗归》等。明末出现单一身份的总集,即以青楼女子为收录对象的《秦淮四美人诗》《青楼韵语》《古今青楼集选》等,这自然与秦淮名妓文化的兴盛有关。《广东古今名媛诗选》《广东名媛诗选》《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

常州词派乃至近代一直占据词学思想核心位置的含蓄蕴藉、要眇委婉的传统理念,并由此构筑了全新的词史观。

二

唐宋词史观是词学的重要问题,对词体审美的认识决定了对词史典范风格流派的认识和取舍。在清代词学史上经历了贯穿始终的南北宋之争。王国维《人间词话》在晚清普遍称颂南宋词的潮流中,特立独行地竖起五代北宋的旗帜,以反潮流的姿态出现在近代词坛。王国维认为五代北宋时期是词史的高峰,南宋之后衰微不振。王国维称五代北宋是“极盛时代”,“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王国维评吴文英、张炎这两位在当时备受推崇的南宋词人云:“梦窗创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王国维对南宋词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矛头直指近代备受推崇的典范南宋词人,尤其是浙西派所推崇的张炎和常州派以及晚清四大家最为推重的吴文英。

胡适对待南宋词的观点与王国维基本一致。胡适认为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诗人的词”是最高峰,而南宋中期至元初的“词匠之词”则毫无价值。王国维所说的“词匠的词”主要指的是南宋姜夔一派。胡适认为南宋词“没有情感”“没有意境”“算不得文学”。胡适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姜夔、张炎、吴文英这些受到清人追捧的南宋词人,“他们(姜夔词人)不惜牺牲词的内容,来牵就音律上的和谐。”吴文英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词选》)。胡适对吴文英词的

三

清代被称为词学“中兴”时期。近代词学家充分肯定了“清词中兴”的伟业,如陈廷焯说:“(词)盛于两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复盛于我国朝也。”(《云韶集》)日派词学家叶恭绰说:“(词)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清名家词序》)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第二十三章中专论“清词之复盛”。他们都认为清词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相媲美,清词实现了“中兴”。

最早与这种主流声音唱反调的是《人间词话》。王国维云:“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词”是最高峰,而南宋中期至元初的“词匠之词”则毫无价值。王国维所说的“词匠的词”主要指的是南宋姜夔一派。胡适认为南宋词“没有情感”“没有意境”“算不得文学”。胡适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姜夔、张炎、吴文英这些受到清人追捧的南宋词人,“他们(姜夔词人)不惜牺牲词的内容,来牵就音律上的和谐。”吴文英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词选》)。胡适对吴文英词的

清词的价值。

继王国维之后,胡适对清词同样持完全否定态度。胡适将清词视为“词的鬼的历史”:“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词选》)胡适明确反对清代是“词的中兴”时代。胡云翼亦明确否定“清词的复兴”之说:“清人的词,因此便堕落了,走上古典主义的死路去了。”“若谓恢复了词的实质上的黄金时代,实是荒谬之言。”(《中国词史略》)郑振铎也持否定清词的态度,他认为从元初至清末是词史上的“模拟期”,“在这个时期之内的词人,只知墨守旧规,依腔填词,因无别创调之能力。”(《中国文学史》)

在涉及清词价值、“清词中兴”这样重大词学论题上,现代派与传统派的认知完全对立。在现代派的清词价值判断方面,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清晰可见。

民国时期是传统词学终结和现代词学兴起的交汇时期。现代派词学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传统词学家不同,现代派词学家大都受西方式文艺思想影响较深,没有传统词学的传承,并不以词学为主业,他们读词、论词、研究词主要是为了文学鉴赏和学术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旧两派构成分野。现代派开创了词学思想的新时代,具有新的学词目的、审美标准以及新的词史观,并深刻地影响到后世。现代派词学的实质是运用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词学的新阐释。考察现代派词学,如溯其源头,王国维《人间词话》导夫先路之功德值得重视。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词学学会副会长)

明弘治、正德之际,“文章李唐新体,驱逐唐儒驾马迁”(朱应登《口占五绝句》),文风丕变。王世懋认为“关中故多秦声,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质直之气倡之一时”,“使先秦两汉之风于今复振,则先生之力也”(《康对山集序》),肯定康海以“太史公质直之气”和“先秦两汉之风”变今追古的典范意义。

作为地域性溯源的“关中故多秦声”与文学性描述的“先秦两汉之风”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汉书·艺文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风气系于水土,内化为人文属性,具有不可更移性与传承性。文学何发现‘关中风气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送秦中诸人引》),认为关中风气植根于水土,与“秦汉之旧”互为表里。康海“览传记之所载”,指出“关中风气习,醇厚闳伟,刚毅强奋,有古之道焉”(《陕西壬午乡举同年会录序》),而南方文人薛应旂明确地指认关中风气与古文辞的关联性,认为“关中风气习,醇厚闳伟,刚毅强奋,莫不有古之道。然自汉以降,其所谓豪杰者,大都欲以古文辞名世,故至于今,关中士人动称‘西京西京’云”(《泾野先生传》)。此种“秦汉之旧”被理想化和定格化为“古之道”,融筑为关中风气,使得关中文辞葆有“秦汉之旧”而盛传复古之风。

作为关中十才子之首,康海在先秦两汉文的兴起中“得风气之先”(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在创作上,其大廷对策、文制古辨,“自有制策以来,鲜见其比”(李开先《对山康侯修撰传》),孝宗以为“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因而“京下传诵则效,文体为之一变”;在理论上,他“论古论文,不少假借,一时在翰林者罔不敛手服之”(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侯先生状》)。于是,“弘治文苑”,按察梦阳谓诗必宗杜甫,康殿撰海谓文必祖马迁,而天下学士大夫多从之”(胡缙宗《西玄集序》)。

这是“百五十年”来一次文学范式的转移,一方面是“追古”,一方面是“变今”。此种范式的转移建立在重新梳理文学谱系和全面检视文学经典的基础上。马理在《于先生墓志铭》中记录了康海阅读经验的演进:他初读三苏文,以为“《老泉集》吾取二三策焉”;读韩柳文,以为“退之吾取其议论焉,子厚吾取其叙事焉已矣”;进而读《史》《汉》,以为“固书所载汉文献尔,迁则春秋、战国前文献在焉。吾与其固宁迁”;读程朱,则认为“文之则六籍可企,迁不足论矣”。由此看来,康海并非对韩柳三苏无所好,取其枝叶而已;他在学理上兼容宋儒,而认为后者是不“文”的。事实上,这不仅是康海的阅读史,也是从唐宋上溯《史记》与六经的文统观。马理把这种创作路径归纳为“凡论著必宗经而于史,以宋人言为俚,以唐为新巧,以秦汉为伯仲而有所效也”。

“宗经而于史”的文学观古已有之,自刘勰以来,即把经与史表述为根本与枝叶的关系。但宋谦认为“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论,而余之所见,则有异于是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文之骨髓,无桀荆之塞,无狄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文原》)。以宋谦的观点看,迁、固之史已经不算六籍宗子,唯有韩、欧可以当之。这是合国体以来被奉为圭臬的观念。直至“武功康海好马迁之史,人对大廷,文制古辨,老宿闻见而惊服”(崔铣《胡氏集序》),遂变韩、欧为史迁。几乎所有评家都注意到了康海对《史记》的推崇和提倡。康海重视《史记》的文献意义,也重视《史记》之文,肯定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记序》)。他还推崇《国语》《左传》,以为“大指无谬于事实,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物之言也”(《送文谷先生序》)。其本质的意义可能还在于重新肯定《国语》《左传》《史记》与六经的关联性,

“一、青楼失行妇人,每多风云月露之作,前人诸选津津乐道,兹集不录。然如柳是、卫融香、湘云、蔡闰诸人,实能以晚节盖故,遵国家准旌之例,选人附录,以示节取。”集以“正始”为名,也显示了这种企图。《国朝闺秀诗雕华集》则以上几方面都注重,其集初名“香咳”,后名“雕华”,均体现了其关注诗作艺术性的企图,惜乎其书不彰。

以上简略陈述了女性总集编纂的种种情形和大致流变,更为深入的研究,尚待来日。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以理为主 以气为辅

康海变今追古的文章探索

□ 杨遇青

赋予其六经宗子的地位。

众所周知,《史记》继《春秋》而作,因此,“宗经而于史”意味着文学书写应由史而上溯经学,兼具纪事与义理上的意义。事实上,复古派作家具有极强的修史意识,他们把方志与族谱视为实践史家笔法的最佳范例。马理认为“予惟史氏亡而族姓志作,科目兴而族姓志不传”(《仇氏族谱序》),视族谱为史氏之苗裔。李梦阳认为“国有史家有谱。嗟乎,生死出处之际大矣,要之不离其事实,而后世何观焉”(《族谱》),指明国史与族谱的同质性。康海说:“夫志者,史之余也;史者,信之成也。”(《邠州志序》)把史志精神归之于信,他恪守史家书法,“不远誉以诬亲,不攘美以欺世”(《樊氏族谱序》),把“太史公质直之气”贯注于谱志写作中。清人以为“爽矣高迈,为能绝去雕绘之习,而简情愠,气气流溢,味之靡穷,盖得子长氏遗韵者”(张洲《康对山先生文集后序》)。其《武功县志》在方志史上有重要地位,“王士禛谓其文简事核,词闲雅雅,石邦教称其义昭功显,尤严而公,乡国之史,莫良于此,非溢美也”,“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康海策论在文章变体中也具有示范意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曰:“海尤有志于经济,集中如《拟廷臣论宁夏事状》及《铸钱论》诸篇,均切中事理;《廷对策》立言有本末。”“诸篇的阅读史,也是从唐宋上溯《史记》与六经的文统观。马理把这种创作路径归纳为“凡论著必宗经而于史,以宋人言为俚,以唐为新巧,以秦汉为伯仲而有所效也”。

“宗经而于史”的文学观古已有之,自刘勰以来,即把经与史表述为根本与枝叶的关系。但宋谦认为“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论,而余之所见,则有异于是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文之骨髓,无桀荆之塞,无狄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文原》)。以宋谦的观点看,迁、固之史已经不算六籍宗子,唯有韩、欧可以当之。这是合国体以来被奉为圭臬的观念。直至“武功康海好马迁之史,人对大廷,文制古辨,老宿闻见而惊服”(崔铣《胡氏集序》),遂变韩、欧为史迁。几乎所有评家都注意到了康海对《史记》的推崇和提倡。康海重视《史记》的文献意义,也重视《史记》之文,肯定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记序》)。他还推崇《国语》《左传》,以为“大指无谬于事实,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物之言也”(《送文谷先生序》)。其本质的意义可能还在于重新肯定《国语》《左传》《史记》与六经的关联性,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遗产

本报教育部·主办
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协办
本期学术主编: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2021年第17期 总第1057期